

小说《陶村兵事》——

从“精神原乡”理解家国英雄

■季思含

新书评介

作家陈延佑创作小说《陶村兵事》(作家出版社)以冀中平原为背景,讲述了陶载石、陶砚瓦等两代陶村人,从抗日战场到和平年代,在同一支部队完成精神接力的故事。小说以独特的叙事,描绘了那些有着“平原精神”基因的军人,在硝烟与和平交替中的人生轨迹和精神图谱,展现了革命军人与这片土地的血脉联结。

在叙事结构上,作者采用时空交叉与双线螺旋的手法,让过去与现在在叙事中不断碰撞,形成独特的艺术效果。比如两代陶村人入伍后到部队报到的情节安排,就突显了这种效果。第一代陶村人陶载石、张鹭州完成新兵集训到部队报到时,一路凭借青纱帐巧妙躲过日本鬼子,隔着一道河望到了部队所在地——程院村。这时,他们突然发现“河的上游,大约150米处,支起一个军用帐篷,帐篷外站着一个日本军官,旁边两个人都端着枪”。带队干部吴力耕低声说道:“不好,一定是敌人得到情报,准备袭击程院村,咱们必须破坏掉敌人的企图,不能让他们得逞。”于是,两个刚刚结束新兵集训的“新兵蛋子”,经历了他们人生第一次真枪实弹的战斗,并干净利落地消灭了这股敌人。

小说到这里,并没有接着叙述陶载石他们如何到部队报到,并受到部队的欢迎和表彰的,而是将笔锋转向几十年后的1972年,第二代陶村人——陶砚瓦等踏上从军征程的情节:“从闷罐车

开动这一刻始,他们便把自己交给了军队,交给了国家,当然心里都有离开了家和亲人的丝丝伤感,更有对即将到来的军营生活的向往……闷罐车到了石家庄北站之后,终于下车吃饭了,主食是大米饭,就一个大锅菜,大伙儿吃了个‘沟满壕平’”。

不论是穿梭在青纱帐里,躲着日本鬼子的陶载石们,还是坐着闷罐车去报道的陶砚瓦们,都奔向同一个方向,奔向同一支部队——“八六一团”。这种“时空折叠”手法所营造的对比与跌宕效果,摆脱了线性叙事的单调乏味,增加了故事的曲折性和吸引力,使得人物命运在关键节点上交汇碰撞,形成独特的艺术张力。

在人物塑造上,《陶村兵事》凸显军人精神与土地的血脉联结。书中的人物,他们像是从冀中平原的泥土里挖出的一株株庄稼——有根有须,还有迎风生长的倔强。如吴力耕,他是陶村小学教书先生,也是小说里第一个当兵的陶村人。他向3个学生道别时的一席话,指明他当兵是要抗日的:“东北没了,华北马上也快没了,蒋介石还是不抵抗!孩子们,半个中国都沦陷了!沦陷了!我要去抗战学院学习,是共产党办的,学完后去当兵,去抗日一线。”而彼时,日本人要来了,国民党籍的深县县长已经携家眷跑路了。

作者用反衬的手法,阐述了吴力耕的从军抗日的“根”是在国家民族危急关头,激发出的民族存亡意识和保家卫国的紧迫感,充分展现冀中平原人民的强烈爱国主义情感。由此,作者把这种情感作为一代代走进军营的陶村人精

神的根,让它“串了根,发了芽”,使得小说中的人物轨迹清晰可见;吴力耕的3个学生,送别了老师后,光着脊梁跪在地上,相互在对方的背上刻下“精忠报国”4个字。作者充分利用这个典型的场景,使得陶村3位少年的形象更加具象化,同时也为他们最终走上抗日前线埋下伏笔。

《陶村兵事》中的很多人物,都带着平原人的印迹。正如陶村人在纪念村里抗日英雄时,用陶村式的谐音梗,把陶载石、张鹭洲、黎崇善的乳名串起:陶家狗,咬石头,黎家熊,拱碌碌。他们是在战火硝烟里成长起来的英雄,但在作者的笔下,他们还是带着泥土味的活脱脱的陶村人。

《陶村兵事》对深州方言的运用地道精妙,不仅增添了地域色彩,更成为刻画人物形象的有效途径。陶载石说的“中不中”里带着庄稼人的实在,战友间喊的“夜个黑介”(昨天晚上)透着生死与共的亲昵,就连陶母骂人的“你个憨货”,也裹着化不开的疼爱。

值得称道的是,作品中诗词的融入。全书融入46首诗词、书词、戏词等,体现了文学表达方式多样性的魅力。既有“此去山河远,犹闻麦穗香,报国非为誉,肝胆照乾坤”的悲壮果决,又有“沅溪才女万人知,素貌冻龄云水居”的典雅之韵;既有乡土文学的细腻之美,也有方言的鲜活之力。这种多元的语言运用,鲜活展现出他们是保家卫国的战士,也是眷恋土地的儿女。另一方面,书中许多地方通过“以诗言志”的方式呈现人物的内心世界。比如吴力耕离开陶村前所写“忍

看平原遭酷屠,男儿不遭泪空枯。行将学业遭遗世,欲逐烽烟作武夫”表达了他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;陶砚瓦在受挫时默写的“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”,暗示了他决心走出困境的韧性和豁达。

小说中反复提炼“宽平远志、正平守节、坦平无私、持平不争”的“平原精神”。这种精神是陶村先辈们在“国难当头,面对最残暴的敌人时呈现出的忠诚勇敢和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”,是他们“不仗仗时好好种地,仗仗时好好打仗”的朴素智慧;是新一代陶村人默默坚守和无私奉献。这种精神是他们“国之所需,我必往之”的担当,更是平原人乡土根脉、生死守护、信仰传承的交融。

小说结尾是“死而复生”的老英雄陶载石回陶村时的情景:“站在四周的群众,没有动员,没有组织,陶村已然空巷,周围村庄的男女老少,也纷纷赶过来,观看陶村这百年不遇的盛况。之前他们听到了宣布,为了让老英雄不受打扰,对所有人都只有一个要求,不许动嘴喧嘩,只许动手鼓掌。”这是陶村人迎接老英雄回村的最高礼仪,是对老英雄最高的致敬方式,更是平原人骨子里那份信仰的延续:“咱村那个轴子,都当上营长了,北头二狗子家那个,从军校毕业当了参谋,文亮的儿子还参加了大阅兵哩,还有两个娃在朱日和也都当了军官,这样可以在部队上多干上几年哩,光荣着呢!”

又一代陶村人走进了我们的部队,我们将看到更多陶村军人的故事。陶村是他们的“精神原乡”。他们的精神也将代代相传中,永远年轻,永远滚烫。

创作谈



“平凡铸就伟大,英雄来自人民。”这是我创作长篇历史小说《风起云扬》(中国言实出版社)时始终铭记的信念。这部小说以徐州地区隐蔽战线的斗争为主线,讲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徐州人民与封建军阀、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壮烈历程。对我来说,这是一次向隐蔽战线英雄的致敬,也是一场穿越历史的深刻心灵之旅。

创作《风起云扬》的灵感,源于我童年时期父亲所讲述的革命故事。他曾在抗战时期担任某军区城工部的地下党员,身着传统的长袍马褂,以一家贸易货栈作为掩护,在青岛等地刺探敌情、护送同志。父亲的事迹如一颗火种,点燃我对隐蔽战线英雄的敬仰。后来,我在徐州市工作,接触到许多参加过地下斗争的老同志。他们回忆起与石西岩、侯五嫂等地下党人并肩作战的往昔岁月,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英勇顽强的精神,深深地震撼了我。从那时起,我便萌生了一个想法:为这些默默无闻的英雄撰写一部长篇小说。

接下来,我带着满腔热忱深入钻研地方党史。如何将数十年的历史、众多的人物和事件浓缩进一部小说?如何让读者感受到那段热血与沧桑的岁月?这些问题如同一道道关卡,考验着我的创作决心。

在一次翻阅旧档案的过程中,我偶然发现了一首绝命诗:“一颗为民心,万古终不灭。壮士非无泪,不为断头流!”这是徐州市一位地下党员在敌人刑场留下的临终遗言。寥寥数字,却如利剑般划破历史的迷雾,让我决心以“寻找隐蔽战线的星火”为主线,深入挖掘徐州地下斗争的真实细节与人物群像。

《风起云扬》以徐州党组织的斗争历程为主线,融入了杨兆麟、郝柏青、户秉刚、颜石峰等众多历史人物的形象。他们虽出身各异,却因共同的理想而汇聚于革命的洪流之中。如何真实而生动地描绘这些人物,成为创作过程中的一大挑战。为此,我采用了“以史实为基础,以细节塑造灵魂”的写作手法,在深入研究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的基础上,挑选出能彰显人物性格与精神风貌的细节进行艺术创作。

例如,杨兆麟,一位曾参与辛亥革命的同盟会会员,亲眼看见那场历史性的变革。他对国民党“有钱‘剿共’,没钱救灾”的做法感到不满,因此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县长的职位。在徐州沦陷后,面对日伪特务提供的高官厚禄,他坚决拒绝,宁愿每日以菜糠为食,也不愿接受敌人的“肉粮”。在创作过程中,我选择这段情节,来刻画他那一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。同时,我引用了他一封家信中的话:“国破家亡,匹夫有责,吾辈当以身许国”,以此展现当时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担当。

在创作过程中,我始终坚持一个原

礼赞徐州抗战「地下星火」

■孙跃先

则:文学作品必须扎根人民,融入生活。在写作风格上,我采用平民化的语言来叙述徐州的故事,大量运用徐州方言和地方风俗,为小说注入生活的质感。我努力复原那个时代的市井生活,使作品始终洋溢着浓郁的“徐州味儿”。

在小说中,鼓楼街的叫卖声、道台衙门的石墙、霸王楼的落日余晖、文庙的琅琅书声,都被勾勒出来。地方特色美食,如冯天兴烧鸡、麻老外卤菜等,点缀于生活细节之中,让人仿佛穿越时空,步入了旧时徐州的街巷。

在对话的塑造上,我致力于使用贴近民众的语言,尽可能地赋予角色真实感。例如作品中,在一位老者为牺牲的烈士整理遗容时,哽咽着说:“八路军真有种!”这句简单直接的“大白话”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,传达了人民对八路军官兵英勇无畏、坚韧不拔的牺牲精神最深切的敬意。

此外,构建故事结构是一项挑战。为了避免故事在25年的跨度中显得支离破碎,我借鉴了报告文学的叙事手法,采用了章回体的结构。我以“十几个关键历史节点”作为线索,例如杨兆麟抗击日寇、顾柏衡策反敌军等,将人物与事件紧密串联。在叙事上,我还尝试了多视角的切换,不仅包括地下党员的主观叙述,还有群众的旁观视角,甚至加入了敌人的视角,以展现斗争的复杂性。这种结构和手法的运用,增强了小说的层次感和可读性。

每当我踏入徐州的老街巷,轻抚那些历经风霜的石墙,似乎能听见革命先烈的坚定步伐,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脉动。《风起云扬》不仅是一部描绘历史的小小说,更是一部向英雄致敬的精神赞歌。先烈们的牺牲与奉献,换来了古城的解放,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。先烈们的革命精神将继续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,激励我们续写新时代勇往直前的新篇章。



视觉阅读

雁翎队

■脱丽

1939年2月,日寇侵占了新安城(当时的安新县城),强迫猎户交出猎枪和“大抬杆”等武器。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,中共新安县委组织水上猎户成立水上游击队——雁翎队。这些“来无影,去无踪”的战士们,利用“大抬杆”和“鹰排”两种水上利器,在白洋淀的广阔水域和芦苇荡之间与敌人机智周旋。雁翎队不仅有效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,更提振了中国人民的士气,书写了一段抗战传奇。

图片选自《红色气质》(商务印书馆)一书第一章“为有牺牲多壮志”的插图,生动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雁翎队的风采。该书精选200余张照片,配以文字出版。珍贵影像和详实讲述的搭配,让读者更深刻感悟到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红色气质。

书里书外

把真感情写出来

■李裴

民奋勇前行的壮丽图景。

提及王久辛,人们会联想到他荣获鲁迅文学奖的力作——《狂雪》。这部长诗在“大雾”和“大雪”的比喻中,表达了对遇难者的深切怀念和对战争(历史)的深刻反思。“我扎入这片血海,瞪圆双目却看不见星光”,情如沸血,让我震撼于“诗是从伤口涌出的歌声”。他的作品,总让我感觉,其中蕴含着一种强烈而深沉的爱。

文学创作的灵感和激情来源于生活。阅读这本书,我们可以发现,个中题材皆是他的亲身经历。作品的字里行间,描摹依形就样,扎扎实实,且想象力飞扬,富有诗情画意,豪放呈现他所见山、水、人的本真。

王久辛在创作上的追求是执着而强烈的。读他的这本诗歌散文集,我感觉到,他并不满足于“尝谓能就所思、所见、所闻者,笔而传之,不失其真,使人

耐看,便是佳文”的境界,而是追求“然非读书明理,有胸襟,有修养,不能有此手笔”的更高视野和更深意蕴。如此,我们便能更好地理解文集的第一篇《紫色的山谷》中“……如坠无尽的混沌中,不知如何运笔”。作者需要时间的沉淀,“一月又过,一月又来”;需要灵感的来临,“昨夜一梦,留影至今”;需要深思细嚼,“梦忆更丰富,细思极美妙”;终至“真是涵意无穷”,于是才“令我终于命笔……”

在诗集中,诗人记录时代变化,讴歌平凡英雄,通过对现实和精神的审美表达,展现深沉的家国情怀和昂扬的时代精神。透过他真挚的文字,我们感受到一幅幅“具象”里,时代生活的鲜活和历史意蕴的浑厚。

比如《格凸河短歌》,写景,写情,终是写人;景中寓情,情入于景,情景交融,终是凸显大写的人。第一句

“行至燕子洞/格凸河便立了起来”,将阅读者带入作品诗意充盈的世界。“蜘蛛蛛攀登的英姿/像我热血沸腾的心……向上,向上/一直向上/我感到蜘蛛蛛的形象啊/一如历史向前时代向前/人类向前/那奔腾不息的力量”,这不正是“勤劳勇敢”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写照吗?可曾见,“立起来的格凸河上……/鱼儿与燕影的相拥与相吻/刹那间的交错相亲/惊出了我的欢喜”;可曾见,“立起来的格凸河上/有一束光柱直抵燕子洞顶……/此情此景,上下天光/在格凸河立起来的/墨绿中闪耀/这个美,是美妙的”山水的洗礼,人文的洗礼,精神的洗礼,在诗句中闪耀。

读完这本诗集,我更加理解了王久辛曾说过的一句话:把自己的真感情写出来,献给自己脚下的土地和心头的亲人。



翻阅军旅诗人王久辛的《紫色的山谷——黔地游记》(贵州出版集团、贵州民族出版社),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愉悦,思绪仿佛在贵州的山水人文之间翱翔。这部诗歌散文集,透过作者的诗人视角,细腻地展现了其见闻与感悟,充沛的情感跃然纸上。他以诗意的笔触生动描绘了这里的人物与故事,勾勒出贵州大地的自然山川之美,以及各族人

新书架



《因为我相信》(新华出版社)一书由《国家相册》栏目组编著。该书从百余集栏目中精选了“长辛店纪事”“血染的黎明”“信仰的力量”等10个故事,并配以300余幅珍贵的历史图片。书中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存亡、发展和复兴的不同历史时期,虽然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,却始终坚守着共同的信仰,展现出不怕牺牲、甘于奉献的精神品质。照片内容涵盖历史战争场景与人物影像;文字部分既有对历史的解读,也有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,力图深入再现真实的历史现场,从独特视角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。(王嘉铭整理)

长征

第6530期

